

宋辽金诗选注

□ □ 中国

古典文学

普及读物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宋辽金诗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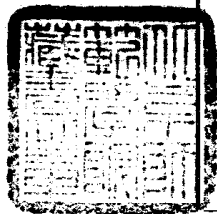
范 宁 华 岩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1903

北 京 出 版 社



1151903

•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

宋辽金诗选注

Song Liao Jin Shi xuan Zhu

范 宁 华 岩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 平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625印张 303,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ISBN 7-200-00452-9/1.77

定价: 5.70 元

前 言

公元十世纪后期至十三世纪下半叶，我国南北先后出现过北宋和辽、南宋和金等政权相互对峙的局面。三百余年间，热血与战火交织，银绢和安宁互换，反抗随压榨而起，战和相继，交聘频繁，争议纷纭。然而，就在这攻伐不息、兴亡交替的岁月里，不同国度的各阶层人物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和他们的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所选的四百一十九首诗作，仅是当时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样式的剪影。

中国古代诗歌萌生以后，先后在春秋战国、汉魏六朝时期呈现光彩，《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和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便是光辉的结晶。到了唐代，积聚了一千多年艺术创作经验的诗歌在繁荣的社会经济、开明的政治气氛、蓬勃的时代精神和发达的文化基础培育和催化下，更是空前繁荣。名家辈出、风神各异的唐诗犹如一座高耸万仞的山峰屹立在诗歌发展史上，让后来的人们叹为观止。鲁迅有句颇有影响的论断，他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致杨霁云》）。

但是，唐以后的宋代诗人们并没有缩手。他们沿着唐人

的足迹在广阔的诗歌表现领域里进一步开拓，把笔触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唐代诗人已经把诗歌从宫廷移到市井，从台阁转到江山和塞漠，那么宋人则进一步地让诗歌由市井扩展到日常琐见杂闻，由江山塞漠伸展到花鸟鱼虫甚至微观领域中。与此同时，宋代诗人们不满足前人对某些事物粗线条的勾勒，力求在那些已被开掘的领域中寻找新的审美感受和新的表达方式，多侧面地深化同一题材的认识意义或审美情趣。前人评价宋诗时说它“题材广而命意新”（《宋诗钞》序引），正是准确抓住了宋诗这一整体特征的。应该指出，宋代诗人们的艺术功底、创作态度以及创新精神都是值得称赞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沿着唐代诗歌那条下斜的边缘，另造出一片独具面目的艺术峰峦来。这片峰峦能否与唐诗比肩并称，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在此以后的六七百年间的封建社会中，是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诗歌可与宋诗相提并论的。

和唐诗比较起来，宋代诗歌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宋代社会发展尤其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同时又与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公元九六〇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建立赵宋王朝。继而，赵氏兄弟先后吞并了北汉和长江流域以南的其它几个政权，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的大部分区域。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宋代统治者在辽国和西夏依旧存在的情况下急于采取对武将严加防范的措施，削弱禁军统帅的兵权，实行高度的权力集中，大量使用文官来管理朝政甚至统领军队。过分的集权和重文抑武的国策给宋代带

来了“积弱”的局面，在对外交往上一贯采取屈己求和的方针，国势衰微，使那个时代的人们失去了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初盛唐诗坛上那种开阔恢宏的气象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片慨叹耻辱、斥责昏愤的悲鸣。徽宗末年，金人南侵，北宋覆亡，高宗赵构等放弃中原，偏安一隅，继续实行妥协政策，压制日益高涨的抗敌复国情绪，但爱国志士的激烈情怀仍不断地在诗歌中倾诉。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宋室灭亡的惨痛事实给诗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爱国主义诗潮终于在南宋时期形成一股洪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代结束了晚唐以来数十年间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社会得到了相对的安定。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经济逐步繁荣。然而，为了输送给辽国和金国大量的银、绢等贡品，为了满足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需求，同时为了维持腐朽冗滥的封建官僚体制，宋代统治者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剥削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宋代许多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用诗歌抨击时弊、关心现实的传统，写下了一系列同情民生疾苦、反对残酷掠夺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题材范围上比唐诗有所发展，在揭示现实矛盾方面也有所深化，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宋代统治者推行的重文抑武政策给宋代文学家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优越的社会地位。严格的科举制度使一大批出身较为低下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参预政治的机会，许多以文学家、诗人面目出现的士子都登上了较高的官位，有的还在政坛上大显过身手，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陈与义、范成大、文天祥等；苏轼、陆游、杨万里、刘克庄

等人虽官位稍低，但也都处于当时政治活动中心。在这些人的周围，还聚集着一大批既有文才又有政治见解的诗人、词家、学者兼政府官员。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大都要求对积弊已深的社会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在“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把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活紧密地拴到一起。由于唐五代以来逐步扩大表现范围的另一文学样式——“词”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坚持“诗庄词媚”观念的宋人往往乐于把涉及私人情感的东西用词来表现，而已经失去歌唱特征的古近体诗则成了表达思想、发表政治见解，甚至成了党同伐异的得力武器。“以议论为诗”这一特点在宋代诗歌里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些作家不屑于终日摹写“区区物象”，他们把国事民生作为着眼点，以生动的事物作为铺陈对象，把自己在政治生活中许多复杂的感受有机地融合在议论之中，并多方面调动比喻、象征、夸张、拟人、移情等手段，把鲜明的政治观点有血有肉地表现出来。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诗人，他们把人生的价值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写下了许多警顽起懦的名篇佳句，传诵千古，收到了一般咏物言情的诗作所无法比拟的社会效果。当然，由于一些诗人在作品中滥发议论，也给宋诗带来了概念化的弊病。程颢、程颐之后，道学家势力大增，理学者们也开始用诗来大谈性命之学，那些抽象的议论和直白的方式损害了诗歌表现生活所必须具有的抒发情感的形象性特征。严格地说，这些押了韵的语录被列入理学讲义中去或许更合适一些，不能和真正的“宋诗”混为一谈。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审美价值都在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人们

审美趣味的转变，从而导致诗歌风神的变异。一般说来，盛唐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山岳宏伟壮观的崇高美在宋人的眼里渐渐消失，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大到星月山川，小到花木虫鱼，无不在诗人的主观情绪支配下活动；而从细微处发现的乐趣比目睹耸人耳目的事物更富有娱人的意味。在社会交往中，几句通达超脱的关照往往抵得上万语千言，令人欣慰。唐诗中所呈现的那种热烈的情怀，宋诗中已沉积为深长的意蕴；唐诗中所展示的那种婀娜的风韵，宋诗中已淡化为隽永的趣味。简言之，唐诗以情、韵取胜，宋诗以意、趣见长。如果说唐诗如香浓味美的醇酒，读之使人如醉如痴、心神皆迷，那么宋诗就象色淡味厚的佳茗，饭后令人心悦神怡、脾肺俱清。上述两种特点在一些简练的咏物写景诗中最易看出，读者自可细细玩味。

以上我们说到的是就诗的内蕴而言。而在诗的外在形式上，宋诗也有自己独特的造诣。中国古近体诗到了唐代，格局已经基本定型。那种整齐划一的句式和格律甚严的字词组合，流传既久非要有所创新、有所变化不可。以长短句为特征的词正是对近体诗的一种发展和改造。宋代文学家在词作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然而他们也没有忘记对近体诗尤其是律诗进行创新。唐人的律诗大都以音韵宛转流动见长，然而发展下去，难免出现平熟之弊。被称作诗圣的大诗人杜甫对这一点偶尔采用拗救的手法使诗的韵律变得顿挫有力。宋代诗人们扩大了拗律的使用范围，并而大量采用仄声字作韵脚，有意识地避熟就生，脱俗求新，追求那种峭刻瘦硬的风格。这些作品乍看时很难随同诗人一道进入那种特定的境界，然而只要反复咀嚼，便会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雄厚

的艺术功底。宋人称读这种诗就象嚼橄榄一样，初苦而后甘，便是十分生动贴切的比喻。当然，在这种追求中，也有不少诗人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中走进了死胡同，只在句律锻炼上下功夫，忽视了诗歌内蕴美的提炼，远离了社会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造纸、印刷术的发达带来了文化的普遍高涨。官办的学校和私人的书院给许多脱离生产劳动的人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而类书、韵书的编纂刊行也为造就更多的饱学之士提供了条件。总的说来，宋代文人的学问普遍高于前人，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感受却显得相对贫乏。为了弥补生活经验上的欠缺，许多诗人乐于到书本中寻找诗意，甚至靠搬弄典故和生僻字眼来炫耀才学。“资书以为诗”和“以才学为诗”确乎是有宋一代众多诗人的通病，一些堆积故实和奇字的诗篇让人看起来十分碍眼，然而只要我们想一下当时文人学士们个个满腹词藻、典故流通量甚为浩大的情形，也许就易于理解诗评家们对诗歌中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典故如此欣赏的缘故，尤其是那些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句子。也许这是许多做学问的人和一些阅历已深的人乐于品藻宋诗的原因之一吧。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宋代诗人不仅喜爱炫耀学问，同时还特别喜欢炫耀智能，他们往往把自己那些精妙的感受和盘托出，向人展现和卖弄，在此同时他们却忽视了给对象留有再创造的余地。和唐诗比较起来，唐诗的作者多乐于把一些富有诗意的意象展现出来，真正的诗味是在读者观着时自我加工而形成的，所以它的意蕴游移不定，视读者的欣赏水平而见深浅；而宋人则爱把整个意象按照自己的特定的领略方式定向地贯穿起来，使处于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都来欣

赏他已经领略到的那种愉悦，这样就限制了读者在欣赏中再创造的自由。所以人们常常感到唐诗含蓄蕴藉，宋诗余味不足。

二

宋代诗歌有着较为复杂、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可以把宋诗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一) 初宋时期。自宋太祖建国之初至宋仁宗天圣八年(960—1030)。宋代立国之初，忙于北讨南征，未暇顾及文学。馆阁臣僚偶有应制，大都沿袭五代余绪，成就不大，倒是跟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的徐铉卓然不群，他用明白浅易的语言写出了怀念故国、感叹人生的忧郁情怀。柳开、王禹偁登上文坛，宋初诗歌方见起色。王禹偁是宋初成就最大的诗人，他以杜甫、白居易的继承者自居，写下了一些关切国运民生的作品，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健康的道路。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5)，杨亿、刘筠等人在为皇帝搜罗历代帝王事迹和典章制度、掌故佚闻，编纂类书的空隙，利用他们熟知典故的优势，互相逞强斗胜，连篇累牍地唱和，并取传说中天帝藏书之所“西方昆仑群玉之府”中的“西昆”二字为题，编纂他们那些堆积词藻的诗篇，一时影响很大，号为“西昆体”。与此同时，宋初还有一些以隐逸之士面目出现的诗人，如魏野、林逋、九僧之流，他们乐于到山野自然风物中寻找愉悦，写一些短小的咏物诗篇，被后人称作“晚唐诗派”。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只是题材细小，境界不开阔，而却没有晚唐诗歌那种途穷日暮的衰飒之气。

(二) 盛宋时期。从仁宗天圣九年起至徽宗即位止(1031—

1100)。这七十年是宋诗最为繁盛的阶段，可谓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天圣九年，刚中进士的欧阳修和颇有诗名的梅尧臣以及古文家尹洙等汇聚洛阳，互相唱酬，切磋诗艺，打破了杨亿等去世后诗坛消沉的局面。继之而来的“庆历新政”的发起和失败给这些抱负远大的诗人提供了契机，他们用诗歌痛陈民生疾苦，抨击保守势力，议论风发，气度非凡，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也是诗文革新活动的主将。他们的诗作揭示社会矛盾，抒发报国志向，表达宦海沉浮之际的愤慨，内容十分充实，而在表现手法上吸收并发展了韩愈诗歌那种议论化、散文化倾向。梅尧臣晚年的作品在含蓄淡远之外，又追求深刻峭厉的风格，这种美学趣味的转变已初步表现了宋代诗人们另辟蹊径的特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继之而起，他们用大量成功的创作巩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成就。尤其是苏轼，他的诗歌不仅多方面地展现了现实生活，而且富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那些纪述山川景物，吟咏自然情趣的作品深深地寄寓着自己对人生的思索，议论和形象紧密结合，思想精辟而诗味盎然。他的诗自然奔放，挥洒自如，诗经的美刺，楚辞的讽怨，汉赋的铺张，陶潜的恬适，李白的雄豪，杜甫的浑涵，韩愈的矫健、白居易的流丽乃至韦应物、刘禹锡等人的特点，在苏诗中兼而有之。苏诗犹如博纳众川、涵汇万状的汪洋大海，无边无际，因风起浪，自然成纹，或汹涌澎湃，骇人耳目；或涟漪微生，摇荡性情……。从审美意义上说，苏轼的诗代表着宋诗的最高成就。黄庭坚是苏门弟子，但他却能另树一帜，根据自己的性情特点，创造出生新瘦硬、精警峭拔的山谷诗风来，也很值得称道。围绕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周围的

各自都有数十名乃至近百名较有名气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拘一格，各呈奇彩，为盛宋时期繁花竞放局面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三) 交替时期。从徽宗初年至南宋高宗退位止(1101—1162)，又称作转折时期。徽宗即位、苏轼的辞世可以作为宋诗繁荣时代结束的标志。徽宗登基不久，在蔡京一伙所谓“变法派的后继者”的怂恿下实行诗禁，是对宋诗发展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北宋末年诗坛一直处于低潮。当年跟随王安石的部分文人此时意得志满，写下了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诗篇，成就甚微；更多的人以黄庭坚、陈师道的诗风为楷模，刻意锻炼，专在翻新前人诗意，点化陈旧典故上做文章，同样地脱离了现实生活，走上了单纯追求字句工巧的歧途。只有晁说之、江端本等人在高压政策下无所畏惧，写下一些讽刺丑类、鞭挞暴行，抨击黑暗的诗章。靖康之难，金人铁蹄惊醒了耽于讲求形式的诗人们，爱国主义激情给瘦硬干枯的诗坛注入了血液，增添了生机。晁说之首先用诗笔记载了颠簸流离之苦，陈与义继之以雄浑悲壮的情调写出了一曲曲沉痛感人的哀歌。刘子翥、吴芾、黄公度等人抒发了故国陆沉之悲、偏安一隅之恨。可惜的是，赵构、秦桧一伙推行妥协方针，不仅扼杀了南宋军民复国抗敌的壮志，也扼杀了这个时期诗人们热烈的情怀。

(四) 中兴时期。从宋孝宗即位起至爱国诗人陆游逝世止(1163—1210)。孝宗是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继位不久便想结束苟且偷安局面，北伐中原，实现“中兴”。由于南宋军队的腐败，国家经济力量不支和太上皇赵构不时掣肘等因素，国家的中兴成了句空话，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

遗山诗》),国运没有中兴,诗坛却再度兴盛起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等“中兴四大诗人”,以悲壮激越的歌声、细致多变的笔触多侧面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爱国诗人,誓雪国耻、抗敌御侮,实现统一是他诗歌中始终贯穿着的主题,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热血男儿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主而奋斗。范成大的诗同样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激情,但他对农民苦难所持有的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决定着他在农村题材诗歌创作上收获更大,《四时田园杂兴》汇集了历代乐府诗、山水田园诗、农事诗及民歌的表现方式,被称为集中国古代田园诗之大成的作品。杨万里的诗思想内容方面不及陆、范深刻,而他那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风物的特征和动态的“诚斋体”,写得新颖、活泼、灵动,富有情趣和幽默感,也很受后人称道。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还有陈造、刘过、姜夔等一大批诗人,分别在揭示社会矛盾,抒发爱国情感,描绘山川风物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 (五)晚宋时期。从陆游去世起到南宋灭亡止(1211—1279)。这一时期先后有三种诗潮。其一是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等在叶适的尽力揄扬下,以“永嘉四灵”的面目出现,标举晚唐诗风。这些诗人的作品眼界狭窄,漠视国难,热衷于在生活琐事中寻找诗的情趣,又拘束于五言律诗范围之内,不论在思想意蕴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缺乏创新,因此不久就不被人们注意了。其二是声势较大的江湖派。这批诗人以浪迹江湖的文人学士为中坚力量,辅以一些官低位微的小官员和隐居山野的处士,他们以傲笑江湖、芥视天下的方式面对社会和人生。其中许多诗人惯于用辛辣而又尖刻的诗

笔抨击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甚至不避权贵，冷嘲热讽，因此曾引起《江湖集》的劈板和短期的诗禁。刘克庄、赵汝遂、戴复古等便是这类关切时事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另一批江湖派诗人，看透了南宋王朝已无法挽救，甘心远离尘世，乐于在自然景物中寻找慰藉，善于用短小的绝句来描绘一些令人赏心悦目的情景，叶绍翁、施枢、张翥等可作代表。其三是爱国诗潮。度宗咸淳十年（1274），元军分兵两路南下，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兵临杭州，逼迫昏愤无能的南宋统治者拱手请降。以文天祥为首的宋末爱国志士用激越凄楚的诗歌给宋代诗坛带来最后一抹晚霞般的光辉，他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诗篇用血和泪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人生荣辱以及历史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最能震撼人们的心灵；而汪元量那诗史般的《醉歌》、《湖州歌》，哀切凄楚地展现了拥有三百二十年历史的赵宋王朝灭亡的惨象。遗民们的黍离之悲如不时响动的琴弦一样久久萦绕……。

三

相对而言，辽、金两个政权社会形态较宋落后，文化也不及宋代发达，然而，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辽金文学尤其是金代文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辽为契丹贵族耶律亿所建，它依靠勇武自立于五代时期，并逐渐扩张到今天的山西、河北北部，这个政权与五代北宋相始终，如加上后辽和西辽，那时间就更长了。随着汉族封建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本不重视文学的辽代统治者也逐步意识到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开始任用诗人文士，象赵延

寿就是汉人入辽者，他的诗便很能体现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面貌和强悍精神。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辽诗多为后期帝王后妃所作，但他们的作品同样能显示出契丹民族的精神风貌。萧观音和萧瑟瑟是两位杰出的女性，她们的诗篇体现辽代统治者崇尚勇武的特点和誓欲征服天下的雄心，还体现了两位不甘寂寞的后妃关心国事、敢于抗争的可贵精神，她们的作品给较为沉寂的辽代诗坛增添了光彩。

金和辽不同，金与南宋互相对峙，它所统治区域的居民多为汉族，所以元好问编金诗名曰《中州集》，所收作品也大都为汉人所作。金代初期，诗坛上较有名气的是那些来自南方的汉族文人。象宇文虚中、高士谈等原均为宋朝官员，出使金朝被留下的。他们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慨叹故国、哀怜身世、思归怀乡的主题。蔡珪、赵秉文、刘迎、王庭筠、赵元等生活在金代中叶，他们的诗作继承苏轼诗歌的特点，重在言志抒怀，很少刻意雕琢，质朴浑厚，被认为是金诗的正宗。刘迎、赵元、宋九嘉、秦略等人用诗揭示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有针砭时弊的作用。他们的景物诗也很多，但艺术上不甚成熟。

金代末期，随着蒙古统治集团的南下，社会急剧动荡起来，人民流离失所，诗人们也失去平静。雷珣的《商歌十首》首发其端，将蒙军侵略后遍野哀鸿的惨景淋漓尽致地诉诸笔端，令人不忍卒读。杰出的诗人元好问和辛愿、李献甫、段克己、段成己等人，在金元之际用沉痛的诗笔描写人民苦难，抒发亡国之悲，把金代诗歌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元好问提倡建安风骨，主张关心民瘼，标举清新自然，慷慨雄健的风格。金亡之后，他的作品用高度概括的诗句和充满真挚情感

的语言，表达了社会动乱给他精神上带来的巨大震动。谴责侵略暴行，悲叹国家覆灭、哀怜生民涂炭、痛陈满腔愤慨，成了他的诗的基本主题。那雄浑凄楚的诗篇里充满着大厦既倾，孤木难支而又心终不平的悲剧色彩，他的学生郝经说他“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很能说明元好问诗的基本格调。

四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本书是为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选编的。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尽量撷取那些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又较为完美的诗篇，尤其注意选录能够代表宋诗美学特征，反映宋人审美情趣的作品，辽、金诗也是如此。宋代诗歌十分繁富，不论在诗人数量上还是诗篇数量上都是《全唐诗》的两倍以上。从如此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代表作来，诚非易事。我们尽可能地翻阅了现存的宋诗总集和别集，适当地参考了一些前人或今人的选本，最后选取了一百二十六位诗人的三百四十七首诗，实际上宋诗中的佳作远不止此。然而，通过这些诗能让读者对宋诗有个大体的了解，我们就甚感欣慰了。辽诗保存甚少，本书选入五位诗人的十一首作品，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金诗共选二十三家，诗作六十一首。我们认为通过这个选本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宋辽金诗各自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不同地位。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在说明文字中或详或略地对诗歌的本事、诗的内容或艺术特点作了介绍或提示。这些只能表明我们对入选作品的疏浅理解，其丰富的内蕴和美学意味尚有待于读者自己去挖掘和玩味。

本书的注释力求简明，个别地方注出了典故的出处。在

给一些流传较广的篇作注时，我们参考了一些选本的注释，择善而从，文中未加说明，在此顺表谢意。另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属首次入选，有的诗前人从未诠释过，我们竭尽绵力，务求准确达意。限于水平，舛讹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及方家多多赐教。

本书从选目到注释工作，一直得到北京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选 注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